

地方感、生态身份与区域形象

——《看得见的东北》的三重建构与文学表达

周弘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6年6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要

文学书写中的“东北形象”长期以来与“黑土地”、“工业”、“闯关东”等历史与文化标签紧密相连，弥漫着拓荒的艰辛、工业的轰鸣与历史的厚重。而在李青松书写的生态文学作品《看得见的东北》中，则将书写空间聚焦于东北一个特定的区域类型——林区，将叙事焦点从社会历史转向广袤的自然生态，建构了东北林区鲜明的地方感，并展现了对林区人生态身份的多重思考，呈现出一个“被遗忘”与“被忽略”的东北形象，这不仅是一部生态文学作品，更是一次对东北地域书写的深度拓疆，丰富了生态文学中对于东北书写的维度，充满着对应怎样重新认识自然、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

关键词

东北林区，地方感，生态身份，区域形象

Sense of Place, Ecological Identity and Regional Image

—The Tripartite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of “Visible Northeast”

Hongrui Zhou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e 12,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e “Northeast image” in literary writing has long been closely linked to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abels such as “black soil”, “industry”,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Kanto region”, permeated with the

文章引用：周弘睿. 地方感、生态身份与区域形象[J]. 国学, 2026, 14(4): 944-950. DOI: 10.12677/cnc.2026.144133

hardships of pioneering, the roar of industry,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 In Li Qingsong's ecological literature work "Visible Northeast", the writing space is focused on a specific regional type in Northeast China—the forest area, shifting the narrative focus from social history to the vast natural ecology, constructing a distinct sense of place in the Northeast forest area, and showing multiple reflections on the ecological identity of the forest people, presenting a "forgotten" and "ignored" image of Northeast China. This is not only an ecological literature work, but also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Northeast region, enriching the dimensions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on Northeast China, full of corresponding reflections on how to re-understand nature and how to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Keywords

Northeast Forest Area, Sense of Place, Ecological Identity, Regional Im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从生态批评的理论视角来看,有关文学与“地方”关系议题的讨论屡见不鲜,但值得关注的是,生态批评不仅关注文学作品中对于自然意象的描写,更致力于探讨“地方感”的营造以及对人类“生态身份”的建构。“地方感”通常指人或群体对某个特定地方产生的情感联系和认同感,是一个融合了个人情感、文化背景、自然环境、集体记忆等多方面的“地方”,它是人们与地方互动的产物;“生态身份”则指人类个体或群体对自身在特定自然环境中的认识,如何界定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达成人与自然的认同。李青松认为,“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它除了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之外,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1]。故而在《看得见的东北》中,他通过文学叙事建构出东北林区独特的“地方感”,并深刻描绘出林区人“生态身份”的变迁与重塑,呈现出一个“被遗忘”与“被忽略”的东北形象,对于如何重塑人与自然、人与地方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2. 生态书写下的东北林区地方感建构

2.1. 自然地理与物种符号构建林区地方感根基

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李青松书写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哈拉哈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等山脉与水系,这些极具代表性且烙有鲜明地域印记的自然地理意象,不仅构筑起东北林区雄浑辽阔的自然地理基底,更勾勒出这片林区的骨架轮廓,流淌出其生命的血液气脉。山脉意象的反复出现,为叙述铺陈出宏阔的空间背景,其被视作“蛮荒冷寂的原生态之地”所兼具的沉默与永恒特质,与世间人事的沧桑变迁形成强烈对照。这些山脉不仅是东北林区独特的地理标识,更成为雄浑、辽阔与坚韧精神的具象象征。而奔腾不息的江河,既是滋养林区万物生灵的生命源泉,更是勾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与维系生态的纽带,李青松“在创作中有意打破线性叙事,通过博物细节的跨时空关联,构建起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的对话”[2]。在《哈拉哈河》这一章中,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交织穿梭,火山喷发造就的河道地貌、成吉思汗挥师的征战过往、诺门罕战役留下的历史伤痕等内容被并置叙写,由此更深刻地凸显出自然生态系统自有的运行规律、内在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与稳定特质,亦以自然的恒常映照出人类文明的荣枯起落、兴衰更迭。书中诸般自然地理意象彼此交织,构建并烘托了东北林区独有的地方底色,这一底色

兼具蓬勃的生命力，亦饱含深厚的历史纵深感，更沉淀着岁月赋予的厚重质感与历史镌刻的伤痕印记。诚如作者所言：“光荣消逝，哈拉哈河沉默不语。也许，沉默也是一种忧伤。” ([3], p. 50)

在这般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东北林区孕育了丰饶无尽的动植物资源，李青松以文学笔法，为此间动植物赋予了深厚的生态内涵与鲜明的地方符号意义。文中以过半笔墨书写了大马哈鱼、鲤鱼、紫貂、黑熊、猫头鹰等标志性物种，这些生灵已超越生物本体的存在，成为东北生态系统的文化符号。作者落笔于大马哈鱼的洄游繁衍、清代东北的鲤鱼贡与贡貂制度，亦书写人类对紫貂、黑熊的过度捕杀，以及猫头鹰的故事化叙事，字里行间既饱含对东北特有野生动物的关注与敬畏，更寄寓着对其濒临灭绝的批判、忧愤与惋惜，亦凝聚着对人类干预自然行为的深层反思与期许。红松作为东北林区的典型植物，被作者赋予近乎人格化的精神特质，李青松笔下描绘红松的至善至美，并非是源于其作为良材的实用价值，“而在于它的群落细部有条不紊的巧妙安排和万事不变的自然法则，在于它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启示，还有勇气、精神和力量。” ([3], p. 199)即便是森林中的蘑菇，也被作者赋予了那份独属于东北林区的生态哲学，“蘑菇，并非意味着生命的残局，他恰恰彰显了倒木、枯木、病木等存在于森林中的价值和意义” ([3], p. 216)。而东北林区，亦从未步入生命的残局。综上所述，这些动植物意象已然超越了其生物本体属性，成为东北林区独特性与生态价值的具象象征，更是读者认知与感知这片土地的重要生态符号。

2.2. 人文意象与情感记忆丰盈林区地方感维度

除此之外，一个完整“地方”的建构，既要依托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基底，更离不开人类活动所赋予这个“地方”的文化意义与情感色彩。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李青松以深切的共情之心，聚焦并勾勒了诸多带有东北林区特质的人文意象，巧妙自然地将这些承载着集体记忆、个人经历与地域历史的文化符号融入文本，使东北林区从纯粹的自然空间升华为兼具情感温度与历史厚度的“人文-生态”共同体。文中所展现的林区的发展轨迹，烙印着工业文明过后的生态伤痕与转型阵痛：曾作为连接林区与外部世界关键桥梁的森林铁路，如今已锈迹斑斑、沉寂落寞，那些镶嵌在泥地里或许早已腐烂的枕木，宛若一条刻在大地上的疤痕，既记录着“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伐木时代的狂热与辉煌，也沉淀着一代林区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作者不仅记述森铁的兴衰，还通过记述回忆老森铁人兰文华等人的命运，让冰冷的工业机器承载起生命的温度，流露着时代变迁中个体的坚守、无奈与怀念。与森铁相伴的林区作业工具，同样是承载记忆与情感的重要意象，大板斧——大肚子锯——弯把子锯——油锯，工具的革新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却也加速了对森林的掠夺式开发，“工具是人类手臂的扩展，人类正是由于使用了工具才做成了一件一件的好事情和一件一件的坏事情。然而，森林需要的不是这些工具，而是时间。” ([3], p. 161)在生态转型下，曾经这些林区作业工具或静卧于博物馆，或被闲置在角落任由岁月蒙尘，已然成为工业文明过后遗留的生态伤痕物证。棚户区作为林区典型的居住形态，既映照出昔日东北“林区荣耀”背后的生活艰辛，更凝聚着林区邻里相濡以沫的温情与共同体精神；而在棚户区逐步改造升级后，当地居民搬入楼房，虽然表面上步入了更便利的生活，却也意味着一种林区传统生活方式的淡出，渐次淡出，以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性人际关系的悄然消解。再观之李青松笔下林区人的生活方式与饮食习俗，进一步丰盈了东北林区地方感的建构。“大鱼上桌，白酒入喉”的豪放民风，根植于严酷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经验，林区人以最好的食物款待来客的淳朴，是艰苦环境淬炼出的豁达与仗义。而这，正是东北林区兼具野性、温暖与蓬勃生命力的“地方感”的鲜活体现。

3. 林区人生态身份的多重建构与嬗变

3.1. 伐木时代背景下林区人的身份建构与迷茫

生态身份，指人们在人格、价值观、行为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对自己与地球关系的理解[4]。它是个体

或群体基于特定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所形成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定位，常常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其对地方的情感联结。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伐木时代”，东北林区人的生态身份是“伐木者”，这一生态身份承载着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为国家建设努力奋斗的集体荣誉感，另一方面则在资源枯竭后陷入难以摆脱的身份困境与迷茫。李青松站在客观的角度，首先记录了这一生态身份的辉煌之面，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木材生产是东北林区的核心产业，东北林区故而肩负起沉重的历史使命，“那个年代，森林是林区的硬道理，木头决定林区人说话的底气” ([3], p. 278)。百万林业工人怀着理想与抱负涌入深山，以豪情与坚忍开凿森铁、砍伐林木。书中多次出现第一代伐木工人马永顺，他曾创造了全国林区手工伐木产量最高纪录，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这一时代“伐木英雄”的象征。这种将个人劳动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而产生的崇高使命感与集体荣誉感，构成了彼时林区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同时，作者并未止步于追忆过往的辉煌，而是以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这一生态身份背后的生态代价与发展困境。伐木的速度远远超过森林生长的速度，当“消大于长”的规律显现，森林早已疲惫不堪，“伐木时代”也不得不走向终结，曾经坚实的“伐木者”身份瞬间摇摇欲坠，“告别伐木时代之后，林区的困惑和尴尬，只有林区人自己知道” ([3], p. 2)。他们所熟悉的伐木、集材等技能在新的生态语境下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变为了“破坏”的象征，李青松敏锐捕捉到了这种生态身份转变过程中集体性的迷茫、失落与身份焦虑。在《林老大话当年》这一章中，李青松写道：“林区不是他们的故乡，但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斧锯之声中消逝的。当日渐残破的森林拖着疲惫的影子退出他们的视线，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根并不在这里，只是他们杂七杂八的口音中已带有浓浓的松树油子味。” ([3], pp. 120~121) 曾经的荣誉感褪去后，留下的是对未来的无所适从和对自身价值的深刻怀疑。林区“积累了诸多问题”，除了生态破坏，也许更深层次的便是人的问题——一代人生态身份的断裂与重构的艰难。李青松通过回忆书写这一群体的命运，深刻揭示了当社会发展模式发生剧烈转向时，依附于旧模式的身份认同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3.2. 绿色生态语境下林区人的角色转向与重塑

在林区告别伐木时代的转型阵痛中，一种新的、以生态价值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身份正在林区悄然萌芽，“伐木者”逐步向着“守护者”与“新农人”转变成长。正如李青松所言：“林区告别了伐木时代，正在掀开绿与美的崭新篇章。” ([3], p. 227) 遍布林区的护林员便是“守护者”新身份的典型代表，他们日复一日地巡护在曾经被砍伐的山林中，防范火灾，监测盗伐，常年值守瞭望，工作内容由过去的“取”转变为如今的“守”。在文中，李青松也提及了民间自发的保护行动，在第3章《鲤鱼圈》中，通过对鲤鱼贡的追忆与现今情况的对比，表明了濒危物种在连续开发下所受到的巨大影响，篇末提及到鲟鲤鱼保护协会，以及通过人工授精方法成功实现鲤鱼批量养殖的科研实践，这些行动标志着人们开始主动承担起修复生态、保护物种的责任，其身份认同也从依附于国家指令转变为与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万物共生共荣。“新农人”的身份则更具创新性，这一身份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探索着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在第4章《大马哈鱼》中，赫哲族年轻一代黑嘎与其克罗地亚妻子冬妮娅的选择便极具象征意义，他们不再完全以传统的渔猎为生，而是利用家乡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和生态资源，经营起乡村生态美食、特产网店等绿色产业。在第16章《大兴安岭笔记》中，作者记录到林区在着力打造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小镇等，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比如蘑菇采摘的兴起，这些不同于“伐木作业”的新业态的从业者，成为了东北林区“新农人”的主体，他们的生态身份逐渐转变为主动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态价值开拓者，其身份认同建立在对生态价值的逐渐认知和对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追求之上。

而对于世代居住于此的赫哲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生态身份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生态智慧和悠久的民族文化记忆之中，呈现出不同于主流社会发展轨迹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赫哲族老人黑嘎爹坚守着传统的渔猎方式，驾着“威乎”在江中劳作，当渔民们搬进政府安排的新居时，他却没

了精神，最终仍然回到自己传统的撮罗子中。他熟知大马哈鱼的洄游规律，怀着对自然的虔诚敬畏之心，恪守着古老的捕捞禁忌。作品中还几次出现林区不同世代人捕鱼或狩猎前举行祭祀仪式的传统，这是长期以来“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生态伦理的外化表现，它时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并提醒人们只是自然共同体中的一员。即便传统渔猎生活因资源变迁而不得不融入新的生产方式，但深植于赫哲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古训——对自然取之有度、心怀敬畏——却历久弥新，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精神基石，唯有将生态伦理融入身份认同，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与可持续共生。

总言之，李青松以自然的笔触勾勒出东北林区人的生态身份以及他们的生态身份兼具的多重内涵与动态演变，同时呈现出的林区人生态身份认同的变迁，本质上是一场从“自然的征服者”到“生态的守护者”的价值重构与精神转型。

4. 文学叙事中的东北区域形象重塑

4.1. 弥补传统文学叙事中东北生态内涵的缺位

在长期形成的中国地域文学叙事脉络里，东北地区常以“北大荒”“工业基地”的形象出现，北大荒文学谱系中，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林予《雁飞塞北》等经典作品，多聚焦垦荒建设的奋斗史诗，着重凸显黑土地的开发价值与社会功用；东北工业题材文学领域，周立波《铁水奔流》、萧军《五月的矿山》等代表作，集中书写东北工业建设的辉煌历程，将东北地域价值锚定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经济维度。即便是曲波《林海雪原》这一极具东北自然标识的经典文本，其笔下苍茫辽阔的林海雪原景致，也仅作为背景景观存在。在这样传统叙事视野下，东北地区的自然价值被简单化、功利化解读，其自身所具备的生态价值、生命本真与各自然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结，常常被遮蔽在书写之外。而李青松在《看得见的东北》中，打破了这样的传统叙事桎梏，他的书写视角转向了对东北林区自然本真的凝视与探寻，他的笔墨落足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连绵的山川脉络，黑龙江、乌苏里江、哈拉哈河奔涌的水系流转，红松、落叶松等林木的生长肌理，以及大马哈鱼、鲤鱼、紫貂、黑熊等各类生物的生存状态。在他的笔下，东北并非只是一个被开垦、被开采的客体，而是一个由山川、河流、树木、生物相互依存、相互联结构成的有机生命共同体，各自然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让这片土地拥有了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的生命逻辑。在《哈拉哈河》这一章中对哈拉哈河的书写中，李青松的生态叙事视角展现得尤为鲜明，他将哈拉哈河置于地质时间的宏大尺度之下进行审视，这种时间维度的切换，让哈拉哈河摆脱了人类历史时间的局限，回归到了自然本身的发展脉络之中。而且李青松的书写并未止步于河流本身，他的笔触延伸至哈拉哈河流域内的生物之上，将这些生物与哈拉哈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赋予了这条河流“孕育者”与“守护者”的双重角色。在这样的书写中，李青松真正将森林、河流与流域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本身作为了叙事的主体和目的，而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背景或附庸，也正是在这样的书写中，东北的地域形象实现了从“被开发的地理空间”到“拥有自身运行规律的生命主体”的升华，这个生命主体活跃而灵动，其存在与发展遵循着自然的法则，而非单纯的人类意志。

黄平曾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论述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以‘抗战’为背景，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5]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承载着沉重而复杂的历史记忆，在文学叙述中也常与“战场”相联系，历史的悲情色彩成为东北地域叙事中难以绕开的基调。比如萧军《八月的乡村》、萧红《生死场》等。同时“伤痕”的底色也往往不可抹去，比如“新东北作家群”中班宇的《缓步》《逍遥游》、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我的朋友安德烈》等。“他们都是沈阳铁西区工厂工人的后代，都在青少年的成长阶段见证了父辈因社会转型中的‘阵痛’而经历的创痛。”^[6]李青松在《看得见的东北》中，并未刻意回避这片土地的沉重历史与伤痕，相反，他直面这些历史记忆，但与传统叙事不同的是，在他的文学叙述中并非单纯渲染历史的悲情，而是以一种

全新的生态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不再将目光仅仅聚焦于政治军事冲突中的人类遭遇，而是在宏大的生态背景之下将视野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命运之上。在文本的叙述中，李青松以直白而极具震撼力的笔墨，再现了战争带给哈拉哈河流域的严重生态破坏，“哈拉哈河河水一度变成了红色。鲜血染成的红色”([3], p. 39)。这短短一句话，勾勒出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红色的河水既是人类生命逝去的见证，也是河流中万千水生生物消亡的象征，更是整个流域生态系统遭受重创的直观体现。而“战争摧毁了人性，也摧毁了河流里的生命。治愈创伤的唯有时间，治愈了自然，也就恢复了自然”([3], p. 40)则进一步揭示了战争对自然与人性的双重摧毁，同时也点明了自然生态系统自身所具有的强大修复能力，时间是治愈生态创伤的核心力量。同时前文也论述到失去了原本工作的林区人也在一步步得到身份的转变与新生。李青松的这种叙述策略，实质上是将东北从过往的“历史悲情”中解放出来，不再让这片土地被历史的苦难所定义，将其置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宏大格局中予以重新定义，从而凸显出生态系统超越人类历史的永恒性与包容性——人类的历史事件只是自然发展长河中的一瞬，而自然始终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延续着自身的发展，这种永恒性与包容性，也让东北的地域形象拥有了更为深厚、更为多元的内涵。与此同时，作品中反复呈现的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森林覆盖率、黑龙江流域的水文状况、生物多样性特征等具体的生态数据与现实状况，都在突出强调着东北地区作为中国东北部重要生态屏障的战略定位与当代价值，也让东北的地域形象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内涵。

4.2. 微观叙事视角下东北区域形象的具象重构

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与运用上，李青松采用了微观史写作的方法，通过个体命运的细微描摹来折射时代发展的宏观变迁，以具体的生活细节来展现东北林区的社会转型，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让宏大的地域叙事与生态书写变得真实可感、触手可及，也让读者能够从个体的生活轨迹与情感体验中，真切地感受到东北林区的时代变化与生态转型。李青松的叙事始终伴随着一个“在场”并且充满忧思与关怀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对森铁工人、赫哲族渔民等普通民众生活轨迹的追踪，书写他们在伐木时代的荣光与奋斗，书写他们在生态转型期的迷茫与困惑，也书写他们成为生态守护者后的坚守与期盼，这些个体的故事，构成了对“新”东北形象这一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森铁、棚户区，这些林区特有的物质遗存，蕴含着特有的情感张力，在《老号森铁》《伐木工具》等章节中，李青松较为细致且严谨地记录了森铁的兴衰历程、伐木工具的演进历史，这些恰恰是理解林区社会变迁的关键线索，森铁的繁荣对应着伐木时代的鼎盛，而森铁的衰落，则标志着伐木时代的终结与生态时代的到来，森铁轨道上的锈迹，森铁车站里的老旧设施，不仅是工业文明的遗存，更是人类与自然关系变迁的历史印记。对大板斧、大肚子锯到弯把子锯再到油锯的工具演变史的考证，并非单纯为了展现林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是试图透过工具的迭代，折射出人类对自然干预程度的不断深化轨迹。与此同时，李青松还记录下了林区的特有术语，“顺山倒”“上挂”“坐殿”等一系列林业生产的专业术语的运用，不仅增强了文本的地域特色，更重要的是，这些术语的记录与保存，实则是对一种即将消失的“地方性知识”的抢救与守护。这些术语作为东北林区特定生产方式的语言结晶，承载着林区独特的生产关系和社会记忆。

通过打破传统的东北文学叙事框架，李青松建构的或许被大多数人“忽略”或“遗忘”的东北形象呈现出丰富而深刻的特质，他从东北本身的自然与人文特质出发，挖掘出了东北地域更为深层的自然价值与人文内涵，将生态书写与地域叙事紧密结合，将生态理念融入地域形象的建构之中，让生态文学不再是单纯的生态理念宣扬，也不再是空洞的环保口号呼喊，而是与地域的历史、文化、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学创作，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传统地域书写的超越，也是对生态文学发展的有益探索。

5. 结语

读李青松的《看得见的东北》，能清晰感受到作品里建构起来的那份独属于东北林区的地方感，这

份地方感不是凭空营造的，而是扎根在对林区自然环境、动植物资源、人文意象的书写中，同时呈现出林区人从“伐木者”到“守护者”与“新农人”生态身份的变迁，以生态视角和微观视角呈现出一个“被遗忘”与“被忽略”的东北形象，其不仅是对自然生态的记录，更是对一种即将消逝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和地方性文化的抢救性保存，为理解东北文化乃至现代中国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文本。作品所深刻揭示的从“征服自然”到“和谐共生”的观念转变，以及所记录的林区转型的实践探索，为当前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地方性知识”和文学镜鉴。在生态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对如何关注人的命运，如何重构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结，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义，正如李青松所说：“生态文学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为了目的而忘了初衷。” [7]

参考文献

- [1] 万芊, 王亭予. 生态文学提醒我们为什么出发——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J]. 今日国土, 2024(8): 4-7.
- [2] 何家欢. 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与重建——评李青松生态散文作品《看得见的东北》[J]. 鄱阳湖学刊, 2025(2): 114-122+159.
- [3] 李青松. 看得见的东北[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
- [4] 邓秀军, 董筱姗. 21 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生态价值观呈现与生态身份建构[J]. 当代电影, 2025(5): 80-88.
- [5] 黄平. “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 60(1): 174-182+223.
- [6] 白杨. 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J]. 当代作家评论, 2023(1): 66-71.
- [7] 李青松. 生态文学提醒我们什么? [J]. 环境教育, 2018(1): 69-71.